

日記中的抗戰群像——「蔣介石與抗戰時期的中國」學術研討會紀要

侯嘉星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2013年6月25日至27日中正文教基金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及人文中心假宜蘭明池山莊舉行「蔣介石與抗戰時期的中國」學術研討會。兩岸學者及研究生34人與會，宣讀論文19篇，且舉行兩場綜合座談會。會議並規畫出版論文集及下年度新主題，期盼繼續強化海內外民國史與蔣介石研究之能量。

緣起

本系列會議之緣起，係自2006年起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陸續開放《蔣中正日記》，為近代史研究注入新材料後，兩岸與海內外民國史研究逐漸掀起新一波高潮。有鑑於此，2007年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邀請呂芳上教授主持「《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讀書會」，以國內學者及研究生為主要成員，亦間有來臺訪問的海外學人與會，遂慢慢成長為海內外學者的民國史及「蔣研究」交流平台。每月1次的讀書會至今年（2013）10月已舉行51次，為國內讀書會少見的長青樹，足見成員們持之以恆的參與熱誠。

不過例行讀書聚會囿於討論時間僅3小時，已遠無法滿足成員們的需求。是以讀書會於2010年假三峽大板根森林溫泉渡假村召開第一次「蔣介石人際網絡研究」會議；2011年於花蓮理想大地度假村舉行第二次「蔣介石日常生活研究」會議（詳見本期刊第一期）。兩次會議後均將會議論文及討論紀錄付梓，先後出版《蔣介石的親情、愛情與友情》（2011）及《蔣介石的日常生活》（2012）二書，廣獲海內外研究者與一般讀者好評。其中《蔣介石的日常生活》出版僅半年一刷便告售罄，近期並有香港、北京等地出版社陸續洽詢出版合作，由此可知讀書會探討的議題實能引起大眾讀者們共鳴。

綜述

今年（2013）是讀書會第三次會議，有別於前兩回聚焦在人際網絡及日常生活等柔性議題上，本次有意地回歸到傳統史學研究的政治、外交及軍事等領域，因此以「蔣介石與抗戰時期的中國」作為會議主軸。會議於6月26日下午在宜蘭明池山莊召開，一共安排六個場次的討論會。開幕式由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院長周惠民及北京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汪朝光主持，致詞中周惠民回顧兩岸學者近年來密切的交流，培養了深厚「革命情感」，對近代史研究產生積極正面的影響；汪朝光則談到過去兩次會議普遍獲得學界肯定，論文集出版也引起很大迴響，提供史學研究面向社會大眾的良好機會。

開幕式後，由東海大學歷史系主任唐啟華主持第一場討論會，主題圍繞著戰時外交工作之開展。首先由國史館館長呂芳上宣讀〈蔣中正、開羅會議與戰後東亞新秩序的形成〉，開羅會議是近代中國首次參加的元首高峰會，為國史重要里程碑，本文以《蔣中正日記》中關於會議開會前後的紀錄，指出這種「大國夢」與當時中國國力的巨大落差，從字裡行間可以深刻感受到弱國領導人與大國外交折衝之戒慎恐懼，這是過往探討開羅會議成就時甚少提及的。其次，由國立臺北大學歷史系教授李朝津宣讀〈重塑世界：抗戰時期中國對戰後世界的發想

與實踐〉，討論戰時蔣介石如何決定外交方針，特別是1940年代初期蔣決定將採親美原則，這對中國戰爭後期、戰後乃至冷戰時期的國家發展帶來深遠影響。第三篇是社科院近史所助理研究員張靜宣讀的〈蔣介石與抗戰時期的國民外交——以中國太平洋國際學會戰時活動為中心〉，中國太平洋國際學會是一個總部在美國的民間學術組織，以亞太地區政經文化為研究內容。作者指出該學會中國分會雖希圖與總會保持互動獨立性，但在國民政府介入後成為政府與美國學界人士溝通的非正式管道，最終使得中國分會於1950年與總會決裂並解散。最後是國史館纂修吳淑鳳宣讀〈中國抗戰下的澳門角色〉，指出抗戰期間葡萄牙為中立國，故澳門並未受到戰爭破壞，然而隨著葡國立場轉變，澳門逐漸傾向日本，配合日本種種要求限制居澳華人行為，這也導致戰後中國對葡要求收回澳門權利的主張，也引起對香港主權的討論，構成中英交涉的複雜局面。本場4篇文章圍繞戰時複雜的外交關係，討論中處處可見國際政治與國家實力的絕對關係，因此儘管政府當局苦心操作，但在現實條件下亦難以在戰後局勢中脫困而出。

第二場討論會由周惠民主持，集中討論抗戰時期派系互動的問題。本場討論由社科院近史所副所長金以林報告〈蔣介石與政學系〉揭開序幕，文中利用《蔣中正日記》與多種日記及回憶錄材料分析政學系組成分子以及運作模式，並指出翁文灝、何濂、錢昌

照、吳鼎昌等政學系人物在政府的體制下，一方面協助管理中央政府或地方要員，二方面則掌握政府規畫設計部門，對重大人事任免等都有參議權；再者政學系人士亦協助蔣溝通國民黨以外的人物或團體，並參與國際交涉和財政金融等事務，對國民政府發揮重要作用。接下來是國史館主任秘書陳立文報告〈蔣介石心中的宋美齡〉，作者指出蔣宋之間的相處模式，似乎是宋美齡寫給丈夫的書信更具有家國意識，很快地由一介少女過渡為第一夫人的角色。其後宋美齡更利用其「蔣夫人」的身分在美國社會掀起風潮，為戰時中國爭取到許多亟需的援助。最後由政大圖檔所副教授邵銘煌報告〈河內三月風暴——蔣中正與汪精衛之最後決裂〉，作者注意到汪精衛在國民政府內部與蔣合作時間少，分庭抗禮競逐權位時間多，而主和的「豔電」一出，即便是汪派的大員亦不敢隨之附和。然真正造成蔣汪決裂的關鍵，是軍統在河內進行暗殺行動，使得汪決意在日本的協助下赴南京組織政府，最終也使得二人的歷史評價判若雲泥。本場討論的3篇文章都與派系有關，也引起與會者們熱烈討論，另外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助理

教授李君山也提到關於國民黨官夫人的角色與共產黨大相逕庭，這是否是蔣夫人光環所致？國民政府官夫人政治角色，無疑地是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的課題。

圓滿完成第一天的討論會後，與會師生們明顯地意猶未盡，所幸緊接晚膳後進行了由汪朝光主持的第一次綜合討論。延續關於派系的話題，汪朝光首先指出派系定義上矛盾之處，同與會者們商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黃克武則引余英時語，指浙東學派多半是事後之詞，來推論學界對政學系或許有擴大認定的可能。呂芳上進一步指出，從政學系的例子來看，應該注意的是蔣介石如何吸納知識分子進入統治體系，因為政學系多半是以學人身分參與政府；更有甚者，蔣介石與汪精衛對知識分子的吸引力也大不相同，所以探討派系政治，還需要回歸探討人才參與的問題。政大歷史系教授劉維開則談到政治學與社會學上對派系有其明確定義，然現實中派系人士往往諱莫如深，因此對派系的認定事實上極為困難，要多方考慮才能下定論。此次綜合討論之高潮，則可以汪朝光之妙語作結，他引用當前大陸地區熱映之話劇〈蔣公的面子〉來譬喻派系與政府關係，固然該話劇是諷刺左右派人士與知識分子對蔣領導的國民政府之立場不同，然而也反映了大陸地區民國史研究不僅在史學界持續升溫，甚至也深入了其他領域，蔚為風潮。

第三場討論會於27日上午召開，由李

君山主持關於抗戰時期軍事建設之討論，分別由中原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皮國立報告〈整備與防禦——中日戰爭中蔣介石對化學戰的準備與應對〉及政大歷史系博士生楊善堯報告〈抗戰前後蔣中正與軍醫制度的規劃〉兩篇論文。皮國立談到儘管一戰後化學武器已被國際條約禁止，但抗戰時無論日本或中國都致力於研發與使用化學武器，但實際上中國當時國防工業能力有限，在化學武器應用上遠不及日本，也使得化學戰不得不以防禦為主，如通過遷移據點、構築工事、化學武器知識乃至精神教育等手段加強國軍的抵抗力，不過成效似乎極為有限。楊善堯則以軍醫制度為線索，談到在現代戰爭中，軍醫除了傳統上維持部隊「再生」力量的治療任務外，也擔負「衛生」這類積極防禦性的任務，從蔣介石對軍隊衛生事務的介入，經歷抗戰時期英美派「醫生從軍」與德日派「軍人業醫」的衝突，最終在戰後整併為國防醫療體系。呂芳上在討論中指出，本場次的兩篇文章都是過去軍事史甚少討論的課題，從中亦可觀察到軍事現代化的進程。

第四場討論會由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王奇生主持，討論主題是抗戰時期的地方事務與社會變遷。第 1 篇發表文章是劉維開之〈蔣中正對川渝地方事務之指示——以手諭與批牘為例的探討〉一文，作者指出陪都制度與四川省地方制度相扞格，而蔣做為國家領導人卻習以手令方式直接管理地方事務，原因之一是重慶在 1941 年改制為直轄市前

雖為陪都，但腹地狹小，與周圍的巴縣、江北縣平級，因此當國防最高委員會成立後即兼責協調重慶與鄰縣之事務，形成此特殊現象。第 2 篇文章是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員黃道炫之〈抗戰時期的「抓壯丁」〉，該文提出抗戰時期出現大量徵兵的現實需求，但是在前現代的中國，無論戶口制度、社會組織等均無法滿足此種高強度的徵兵作業，於是演變成抓壯丁的普遍行為。不僅在國民政府統治區有這種現象，即便在共黨控制區內兵役也被群眾視為沉重負擔，對整體中國社會經濟帶來負面影響。第 3 篇是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生許秀孟的〈初探抗戰時期的逃難〉，抗戰爆發後因戰亂而產生大量流離人口，作者一方面探討這些難民們身分階級等結構因素，以及他們逃難路線選擇、路途困難和政府或其他組織之幫助等問題；另一方面則探討大後方接納這些難民引發的歧視、物價踴貴等難題。本場次的 3 篇文章正好互相闡述戰時體制下政府治理的困難，以及權宜之計下累積的社會問題，這些矛盾終將對戰後局勢帶來沉重影響。

午膳後舉行第五場討論會，由金以林主持，主要探討抗戰時國內外局勢變遷之影響。本場發表論文包括汪朝光〈抗戰勝利的喜悅與對日處置的糾結——由蔣介石日記觀其戰後對日處置的一面〉、李君山〈抗戰時期蔣介石對中日關係的擘畫（1937-1945）〉以及社科院近史所副研究員羅敏敏〈「和俄制共」：蔣介石與抗戰初期的國

共關係〉等篇文章。首先，汪朝光藉由分析《蔣介石日記》中在抗戰勝利後的相關紀錄，認為蔣一方面固然有堅苦卓絕奮鬥成功之喜悅，但另一方面卻面對戰後局勢有更深刻的憂慮。特別是經

歷了國共互相競爭接收、蘇俄強占東北等重重困難後，對日之處置不免預留退路，示之以寬大，此乃現實考量所致。其次，李君山探討抗戰八年期間蔣對中日關係的轉變，約略可分由謀求和局轉為聯蘇抗日、再轉為聯英美抗日三個階段，最後終能取得成功，其政治眼光之準確應給予正面肯定。最後，羅敏注意到西安事變後雖然有短暫國共合作關係，但雙方猜忌並未稍減。嗣後因國民政府外交政策轉變，由聯蘇轉變為聯英美後，在共黨問題上由聯共抗日轉為剿共，不過在戰時特殊的軍事條件下剿共殊為不易，故成效有限。本場討論 3 篇文章均圍繞在國際情勢與內政互動上，艱難抗戰使得政府控制力減弱，並相當程度仰賴國際支持，也埋下戰後風雲變色的遠因。



與會者們在宜蘭明池山莊神木前合影（攝影／楊善堯）

最後一場討論會由黃克武主持，發表演文聚焦於知識分子進入政府體制的課題。首先由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王良卿報告〈對於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背景的再考察〉，該文指

出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的背景，實因蔣介石乃至其他國民黨人對於救國的期望所致，由蔣日記亦可發現改組秘密組織亦為其重要目標，因此希望成立一個「青年運動組織」，廣泛吸納各派系加入，甚至藉此號召社會青年擴大政治參與的基礎，是故三青團成立可說有極複雜的背景。接著是社科院近史所副研究員賀淵報告〈「和平運動」中的陶希聖〉，作者提出陶希聖雖然是和平運動的提倡者，以知識分子從政長期追隨汪精衛，但在與日本協商時意識到組織政府對國家主權傷害深遠，故在隨汪赴寧最後一刻懸崖勒馬，彼此分道揚鑣。最後是政大歷史系博士生趙席夔報告〈由汪精衛與知識分子交往側看蔣汪的歧異〉，文中論及汪比蔣更有兼容並蓄的容量，也較具支持民主法治的傾向，

因此更受到知識分子歡迎。且由於蔣汪對知識分子號召力的差異，也使得戰後蔣迅速失去八年抗戰累積的聲望，遭到知識分子嚴厲抨擊。本場討論主題與第二場派系問題可互相闡發，反映不同群體間彼此複雜的人際網絡，此種關係又與領導者性格息息相關。

展望

在第二場綜合討論暨閉幕式中，主持人呂芳上首先談到本次會議激盪出關於派系政治運作的課題值得深入討論，並希望擴大參考其他私人材料進一步研究，指出明年可嘗試以「日記中的蔣介石」為題，從黨政要人

日記中回過頭來探討蔣的歷史形象。金以林同樣十分肯定這個主題，認為民國政要私人資料正陸續公開，相關研究依然深具潛力。王良卿則進一步指出對於使用這些日記或私人材料應該形成系統性的研究方法，正好藉此會議激盪形成，對學界的貢獻將更為深遠。黃克武亦主張過去甚少討論政學系如翁文灝等人，其實代表著國民政府統制經濟的思想，因此通過新材料的開發，將為國史研究帶來更多新意。最後汪朝光則給予會議高度肯定，特別是本系列會議中討論議題自由開放，所帶來的啟發亦遠超過其他研討會，因此深盼未來持續舉行，為兩岸近代史學界厚植研究能量。

中華民國邁向近代國家的歷程 -----
由專家學者訴說建國百年來的理想、艱辛與成果

執行編輯：吳淑鳳、薛月順、張世瑛

以37篇論文分述中華民國建國歷程中關於共和體制及憲政的逐步生根，國家體制的建構、多元民族的國家認同、學術與文化的新創與省思，從各種面向呈現近代國家、民族與國民的塑造。

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近代國家的型塑

SHAPING THE MODERN NATION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Centennial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近代國家的型塑

訂購請洽「國史館出版品訂購處」 2013年6月初版 精裝全2冊：900元